

# 浙南跨国移民潮的历史变迁\*

刘莹

(暨南大学,广州 510632)

**摘要:**浙南跨国移民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移民潮的兴衰变迁在中国华侨华人史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本文侧重于梳理历史上及当代浙南跨国移民潮的历史变迁,分析各阶段移民潮的成因及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当代浙南新移民潮的成因及其发展趋势,以期对中国华侨华人史研究、区域史研究以及当代侨务工作有所裨益。

**关键词:**浙南;跨国移民潮;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D6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9)01-0066-08

论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际移民活动,最引人注目者,不外乎福建省的福州地区和浙江省的温州与青田地区。有关福州地区的跨国移民活动,中外学术界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尤以厦门大学 and 福建师范大学的研究成果为显著。相形之下,浙江南部以温州、青田为代表的跨国移民潮却较少为学术界所关注,而且缺乏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动态考察浙南跨国移民潮的兴衰变化。浙南地区的跨国移民活动是否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根源、地理因素和文化特征?如果像福建沿海地区一样,浙南地区的跨国移民活动亦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那么,该地区国际移民历史的变迁脉络如何?改革开放后,浙南地区的跨国新移民潮为何骤然兴起?其发展的规模和变化趋势又是如何?本文拟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记载,结合笔者本人在温州和青田地区的实地工作调查访谈,重点考察浙南地区跨国移民潮的历史变迁过程,分析浙南移民潮产生并延续的深层原因,并探讨这一地区跨国移民潮的发展趋势。

\* 收稿日期:2008-01-06

作者简介:刘莹,女,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干部。

相关的代表性研究包括:周望森、陈孟林:《青田华侨史稿》,未刊本,青田县归国华侨联合会编印;周望森:《青田石雕与青田华侨》,载《华人华侨论丛》第二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周望森:《浙南移民意识述论》,载《华人华侨论丛》第三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吕惠进:《浙南海外移民群体的形成原因及其特征》,《人文地理》2002年6月等。

## 一、历史上的浙南跨国移民

浙南跨国移民传统的形成,与浙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特点密不可分。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不适用于解释一切人类历史发展,但在理解浙南跨国移民历史传统方面,地理环境则是必须重视的一个因素。

浙南地区是指现今温州市辖下的9个县(市)区及丽水辖下的青田县地区。这一地区北靠山区,东临大海。其中温州虽然也是港口城市,但在闭关锁国的时代海运优势无法发挥,主要只是起到了经瓯江与内地联系的作用。同地处平原,拥有杭州、宁波等历史名城的浙北地区相比,浙南地区受地理环境制约,交通相对闭塞,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浙南地区同内地商业经济网络联系的相对薄弱,是近代开埠之后浙南民众勇于选择出洋谋生的一大影响因素。

提及浙南跨国移民,乃至近代中国的跨国移民潮的兴起,通常要追溯到“青田石”输出的历史,这也与浙南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关。浙南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青田地区出产一种特色矿产叶腊石,其中尤以山口蜡石矿规模最大,并且是世界闻名的大型叶腊石矿床。山口叶腊石是一种质地优良的工艺雕刻石料,因地得名而有“青田石”之称。<sup>[1]</sup>青田石的开采和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光绪《青田县志》载:“枫(封)门洞,岩穴深广,可容百余人”。<sup>[2]</sup>作为浙南地区海外移民最早、规模最大的青田人,正是得益于青田山口叶腊石矿的开发利用和大量外销。

一般认为,浙南地区移民群体的产生肇始于青田县,而青田跨国移民的风行就是受出洋“贩卖青田石致富”传说的影响。青田人具体是何时开始移民海外以贩卖青田石为生,已难考证。据民国24年英文版《中国年鉴》所载:“在十七、十八世纪年间,就有少数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大陆从商,初期前往者,以浙江青田籍人为多,贩卖青田石制品。”<sup>[3]</sup>清道光末期(约1842年左右),即有青田方山乡人到俄国的圣彼得堡、明斯克贩卖石雕。同治三年(1864年),青田方山乡邵山村杨灿勋绕道好望角到英国经销石雕。<sup>[4]</sup>这些都是比较具体的有关青田人携“青田石”出国谋生的记录。

显然,青田人携“青田石”出国谋生并非偶然现象,青田石与浙南跨国移民之间当有密切关系。1927年9月,陈里特先生曾在莫斯科就此作过调查。一位早期靠贩卖青田石辗转赴欧的青田老华侨陈元丰向其口述了其亲身经历:“……我们三人从马赛到了巴黎,还到了瑞士,三年一共赚了不少钱。回国后,家乡都听到了这个消息,许多人都照着我们的办法去做。这样青田人去欧洲经商的络绎不绝,最多的时候,青田人在欧洲的达三万几千人”。<sup>[5]</sup>

从青田地区发端的携石出洋贩卖的风气,后来影响到邻近的温州地区,尤其是直接与青田毗邻的文成县。据文献记载,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有东头乡黄河村胡国恒,随其青田县汤垟乡山炮村舅父,先从上海渡洋赴西欧贩卖石雕,再从欧洲辗转至南美洲,并在阿根廷侨居了10多年。<sup>[6]</sup>携石出洋贩卖的风气也进一步辐射影响了文成县的玉壶、瑞安县的丽岙、白门、桂峰、永嘉县的瓯北等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文成县及其周边地区先后形成了出洋热潮。<sup>[7]</sup>可见,浙南早期移民潮正是围绕着青田县为中心辐射展开,青田人携石出洋谋生获利的传闻对其周边地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如果说“青田石”传说代表了浙南早期出洋谋生的开端及其特色,那么考察浙南地区跨国移民

---

从行政区划的历史上看,青田合于温州的时间多于分离的时间。由于地缘关系密切,青田与温州连成一片,在地理、语言、习俗、婚姻和经济活动等方面与温州联系密切。青田县南接温州文成县,文成县西北部原属青田县辖地,在地域语言、亲谊风俗上均存有相互通联关系。参见朱礼主编:《文成华侨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页。

的历史则必须结合更为广阔的历史大背景。近代以降,浙南地区跨国移民潮大致可以分为晚清出洋谋生、民国早期赴日移民潮和抗战之前的赴欧移民潮3个阶段。

### (一)晚清出洋谋生时期(1842 - 1910年)

随着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进入五口通商时代。虽然清政府仍然禁止国民出国,但通过“苦力”贸易的形式,许多中国人开始出洋谋生。1893年清政府正式废除沿袭长达200多年的海禁旧规,允许国民出国,从此国人出国人数明显增多。在这一背景下,光绪年间浙南人已分布巴西、意大利、墨西哥、美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南洋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贩销石雕。其中受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的影响,欧洲成为浙南人的主要移居目的地。根据陈里特关于早期青田移民口述资料的记载,前文所提及的陈元丰一般被认为是青田石雕海外商业化的鼻祖,也是青田人移民欧洲的开端。另据青田县华侨历史陈列馆提供的数据显示,至辛亥革命前夕,青田人出国已有三四千之多,青田人出国已成为风气。

### (二)民国早期赴日移民潮(1911 - 1928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大陆战火纷飞,阻碍了浙南移民的出入。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工厂企业普遍缺乏劳力,日本政府为招徕廉价劳力,实施对外开放政策。这段时期浙南人移民日本蔚然成风,以文成县为例,从1911年至1929年间,共有469人出国,其中选择赴日的多达268人。<sup>[8]</sup>1919年至1928年,青田县共有427人赴日本,其中1920至1922年3年间就多达158人。<sup>[9]</sup>

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给浙南移民潮也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一时期温州、处州两地华工商贩东渡日本谋生的人数急增,但日本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经济矛盾,对华工采取了驱逐措施。1923年9月1日至8日,日本自卫团、在乡军人、社会青年团等乘关东大地震社会混乱之机,残杀温州旅日华工700余人。日本政府自9月17日至11月18日分期分批将在日受灾中国侨民遣返回国,其中仅温处两地受灾侨民被遣送的就有4445人。<sup>[10]</sup>从此,浙南留居日本做工或从事小商贩的人数骤减,移居日本的热潮也因此而告终。

### (三)抗战之前的赴欧移民潮(1929 - 1937年)

这一时期浙南赴欧移民潮的形成与浙南早期的出国风气密不可分。一战结束后,山东籍等北方劳工绝大多数被遣送回国,但近2000名青田华工却在历史悠久的“行商”传统的驱使下,利用先前移民欧洲的青田商贩既有的网络,得以在欧洲获得生存。据麻卓民先生所作的调查,“当时里昂车站附近的拉奇诺巷和白玉洛巷,青田人的行业已经比较多,如开旅馆的有夏岳山,开饭店的有吴耀廷、周明岩,开酒吧的有夏成仁,做批发生意的有叶秀甫,养豆芽的有吴端孝,开赌家的有林岩权”。<sup>[11]</sup>随着欧洲开始步入战后复苏,旅欧华侨纷纷提携国内亲友到欧洲创业,所以在20世纪20、30年代形成了青田人赴欧洲移民潮,当时约有25000名青田华侨在欧洲定居生活。<sup>[12]</sup>同青田相邻的温州地区也深受影响。从1929年开始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浙南形成了移民潮。在这近9年期间,仅文成县就向海外移民808人,其中1935年和1936年两年出国人数就达到334人。<sup>[13]</sup>二战爆发后,浙南海外华侨的人数严重萎缩。

青田华侨的“先锋移民”所引发的历史上的浙南跨国移民潮,既有“青田石”独特产业开辟出路的原因,又有国内经济发展滞后、政治动荡的原因。而历史上的浙南跨国移民潮对于近100多年来浙南华侨群体的不断壮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奠定了跨国移民网络的基础。

## 二、当代浙南跨国移民活动的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对中国公民出入境实行严格的限制,

中国移民出国呈半停顿状态。随着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海外移民的数量骤然增加,兴起了新一轮的移民潮。浙南地区凭借早期形成的跨国移民网络,其移民潮更是达到了空前规模。以改革开放、出入境管理法和反偷渡法的颁布等历史性事件为标志,现当代浙南跨国移民活动大致可以分为 4 个阶段:

#### (一) 改革开放前的移民形势(1949 - 1978 年)

20 世纪 50、60 年代,在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下,出于国内形势的需要,中国政府在公民出入境管理上实施了极其严格的规定,这一时期无论是移居海外还是回乡探亲,都出现人数少、规模小的现象。尽管如此,浙南人移民海外的活动却没有完全停止过。二战之后随着欧洲的复兴,旅欧华侨的事业也进入了发展时期,一些早期移居欧洲的老华侨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急需国内亲人赴欧协助发展或继承产业,他们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能促成至亲出国移民。荷兰的青田温州华侨在新中国成立后多表示拥戴社会主义祖国。他们在返乡时以“爱国华侨”的身份获取家乡政府对其身份的认同,进而提出“父子团聚”、“事业发展需要帮手以便日后更好支持家乡建设”等合情合理的要求,从而使家乡有关部门对其网开一面。<sup>[14]</sup>

在出国审批制度严格的时代,侨乡出国却曾一度比其他地区更为艰难。以青田县为例,1954 年全县仅 3 人提出出国申请,全部未能获准;1955 年有 7 人提出出国申请,仅批准 3 人。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已经移居青田县以外的、包括归侨在内的青田人在申请出国方面,当地审批却表现出明显的宽松。余杭县(现杭州余杭区)闲林镇归侨农场系由旅欧青田归侨兴建。1956 年,该农场归侨中申请再出国者,竟能全数获准,得以重返意大利。<sup>[15]</sup>但就移民过程而言,总体上是较多周折,通常需要一年半载,有的还要再转道第三地或第三国。仍以青田为例,从 1950 年至 1959 年全县申请者获准出国的仅 152 人,1960 年至 1965 年,全县正式批准出国的为 124 人,1966 年至 1976 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 10 年间,获准出国的仅有 91 人。<sup>[16]</sup>在另一侨乡文成县,在建国之后的 20 年间,正式经由县公安局办理出国手续的仅有 130 人。<sup>[17]</sup>

表 1 浙江省取得护照往国外移居的人数

年份	人数
1978	956 人
1979	2044 人
1980	2551 人
1981	1871 人
1982	1839 人
1983	3019 人
1984	3609 人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第 169 页。

凭借灵活的头脑、顽强的韧性,打移民“擦边球”、“曲线移民”的作法,浙南人悄无声息地移民国外。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放宽出境限制,而西欧移民政策摇摆不定时,浙南人更是把这一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 (二) 改革开放早期的移民潮(1978 - 1985)

浙南地区是二战前西欧华侨的主要原居地。随着 1971 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西欧的老华侨纷纷以“家庭团聚”为由,向所在国政府申请自己在中国家乡的亲人移民入境。大约从 70 年代中期起,青田、温州等侨乡申请并获准出国的人数开始明显上升。1978 年文成县批准 101 人出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该地区年度出国人数首次突破百数关。<sup>[18]</sup>1978 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全面放宽和改进华侨、侨眷出境审批,浙江省出国人数逐年递增。据 1980 年浙江省的侨情普查显示,其中浙南地区的温州、青田、瑞安、永嘉、文成 5 市县占了旅居欧洲的浙江籍移民的 83%。

## (三) 出入境管理法颁布后的移民潮发展(1986 - 1993)

1985 年 11 月,中国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申请出国是中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标志着中国的移民程序操作开始同国际接轨。自该法律正式付诸实施之后,浙南人移民海外的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新一轮规模空前的出国高潮,浙江省也跃居成为全国的华侨大省。

以文城县为例,从 1985 年至 1989 年,全县共办理出国护照 5 655 本,实际出国人数 3 150 人,加上 1990 年出国数 1 946 人,6 年时间持正式批准手续出国华侨达 5 096 人,约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移居海外总数的二分之一。在著名侨乡文城县玉壶镇,几乎每天都有在车站欢送亲人踏上出国之路的场面。1987 年 4 月份,北京的某几家旅馆及飞往西欧的某几个航班,竟几乎全被文成人“占领”。玉壶镇有华侨 9 119 人,占全县华侨总数 58.5%。其中华侨最多的村为玉壶镇中村,华侨 1 240 人,占在村总人口的 95%。<sup>[19]</sup>

## (四) 移民管理体系健全化时期(1994 年至今)

1993 年 6 月发生了“金色冒险号”中国非法移民抢滩登陆美国海岸的严重事件。1994 年 3 月 5 日,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19 号主席令《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sup>[20]</sup>正如李明欢教授之见,1994 年是为 20 世纪后期中国大陆移民潮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大陆新移民潮开始从失序状态向有序状态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初浙南地区偷渡现象一度严重泛滥。当地政府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加强了对当地群众的教育、监控与管理,教育引导符合出国条件的乡民走合法移民的道路,并为其提供申办证方面的方便,浙南跨国移民潮在逐步规范化中延续。

据 1998 年文城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对旅外人员情况的调查,全县旅外华侨华人数已达 58 076 人,相当于全县总人口 37 万人的 15.7%,较之《文城县志》所载 1990 年底旅外华侨华人数 15 600 人净增 42 476 人。特别是 1997 年,出境 4 676 人,1998 年出境 5 219 人,是有史以来所属县民向海外移居最多的年份。<sup>[21]</sup>其中,出国移民潮中青年人占了很大的比例。据笔者 2007 年 8 月和 9 月期间先后在青田县方山乡和文城县玉壶镇等地的实地走访调查发现,在这些地区从事体力劳动的年轻人大多都是来自偏远山区的打工者,当地的人口结构基本上是以老人、小孩为主。另据从青田中学获得的数据来看,自 1949 年至 1999 年上半年,青田中学约有 6 000 名毕业生出国,约占同期毕业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出国高峰主要集中于 20 世纪 90 年代。

# 三、当代浙南新移民潮成因

## (一) 国内政策的放宽

改革开放以来浙南新移民潮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这与国家在改革开放后,放宽对公民出入境的限制,出台了一系列利民便民的政策直接相关。1978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放宽和改进华侨、

侨眷出境审批的意见》,规定凡申请理由正当,前往国家允许入境的出境申请,均可予以批准。鉴于归侨和侨眷申请出国者增多,1982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家人事局、国家劳动总局、财政部、公安部又联合签发了《关于归侨、侨眷出境探亲待遇问题的通知》,通知给予归侨、侨眷出境探亲以特殊照顾,其中明文规定:“只要对方不限制入境,我方应尽快审批。”这一文件为归侨、侨眷比例甚高的“侨乡人”申请出国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sup>[22]</sup>特别是1985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的颁布及随后有关细则的制订,简化了出国手续,为中国公民出国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极大地方便了中国公民的移民活动。据统计,1979-1995年底浙江省公安机关批准公民因私出国22万余人,而浙南地区占1/2强。<sup>[23]</sup>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变化表明,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纠正了对“文革”时期华侨及“海外关系”的种种错误做法。一系列服务归侨、侨眷的政策出台后,更是大大调动了广大归侨、侨眷的积极性,带动了侨乡经济的发展。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改善了农村人民的生活和经济水平,增强了浙南人民追求幸福的进取心,也为筹集出国费用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所以可以认为,当代浙南新移民潮的出现,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产物。

## (二) 移入国的政策的变化

西欧国家在二战后曾面临劳动力贫乏无法满足复兴重建需要的局面,故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招募外国劳工。至70年代初,这种工作移民的迁移规模达到了1500万人。<sup>[24]</sup>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许多国家也一度放宽了对中国公民的入境限制。

虽然外籍劳工为战后欧洲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西欧社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一般是对外籍劳工移民实行限制政策,主张外籍劳工在结束工作后回国定居。1973年后大多数西欧国家相继停止了招募外国劳工的政策。<sup>[25]</sup>进入80、90年代后,一些西欧主要国家制定的移民政策基本都实行三大基本原则:一是以民族主义为主导,希望在欧共同体成员国内部进行劳动力调节,不再从非欧洲国家引入劳动力;二是以人道主义为原则,对“家庭团聚”、“政治难民”入境网开一面;三是对“本国无法提供的特殊人才”,给予发放有限的入境签证。<sup>[26]</sup>但是,西欧国家中仍然存在对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大量需求,为非法移民营造了特殊空间。在许多西欧国家,雇主雇用一位合法工人的费用等于雇用1.5-2位非法移民劳工。雇主为降低劳动成本而雇用非法移民的现象长期延续。<sup>[27]</sup>

西欧国家有关当局为制止非法移民曾一再强调,一旦发现非法移民将予以遣送回国,雇主也将被课以重罚。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却又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对业已入境的非法移民实行有选择、有限度的“大赦”政策,给予非法移民一定的合法化机会。80、90年代西欧对非法移民曾经实施大赦政策的国家主要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欧国家的这种“大赦”机会,使非法移民产生了某种心理期待,并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继续涌入的诱因。许多浙南人在通过家庭团聚的正规途径移民欧洲的同时,也有相当数量是通过非法入境移民欧洲,等待“大赦”的机遇,由此获取当地合法身份。

## (三) 侨乡移民文化

“侨乡移民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群体成员普遍接受并内化的文化模式。文化具有传递性,侨乡移民文化表现的更为明显,既有相邻地域的横向传递,更有特定地域内代代相传。随着改革开放后国家政策的放宽,浙南人谋求经济改善、发家致富的心理越来越迫切,先期移居海外的浙南人从国外汇来大批的侨汇,使家人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返乡移民纷纷以盖楼房、修祖坟的形式来证明他们在海外的成功。这些都令侨乡人向往,起到了示范作用,形成了“改变现状,一定要出国”、“一人出国,全家光荣”的社会观念。

侨乡的社会氛围推动了跨国移民的不断延续,浙南人“重情份、爱面子”,移民海外历来是靠“亲带亲、邻带邻”这一传统,老华侨为国内的亲朋好友提供必要的帮助,同乡之间相互资助都是理所当

然、受尊重的行为。“1987年后形成番邦热,乡人千方百计筹资出国。后金村吴柏权、裘山村季友菊尽心尽力为亲朋好友办理出国手续<sup>[28]</sup>,在《方山乡志》中特别记录此事,褒奖之意显而易见。可见,“移民文化”依然是浙南侨乡的主流文化,一代代的侨乡人正是在这种移民传统中理所当然地追随着前辈们移民的足迹。

#### (四) 长期形成的跨国移民网络

浙南地区的新移民潮中迁移者大都是与移入国人口有某些联系的人,在国外谋生也多是投亲靠友、同乡介绍。跨国移民与移居国已有移民的联系构成了一个不断延伸的跨国移民网络,中国人的亲缘关系与宗亲观念是维系网络的纽带,社会网络在提供移民信息、就业机会、创业商机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有网络会促成新网络的产生,而迁移本身也不断促进社会网络的延伸,这是动态变化的过程。移民网络构成了一种社会资本,降低了迁移、谋生的成本,减少风险。

每一个已经出国的乡人都可能是新移民链的起点,由此如滚雪球般带出一批后续的移民。以《郑氏家族侨谱》为例,从1936年第一代移民开始,经历几代60年漫长的艰苦奋斗,家族出国人数如今已达153人。<sup>[29]</sup>在浙南侨乡,一人早期先行出国,继而带走“九族”中的人,这样若干代之后在海外形成数十至数百人的大家庭,在浙南地区移居海外的家庭集团少说也有上千个,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奥地利、比利时等国大中城市集居或散居着,甚至有300-400人的特大家族。<sup>[30]</sup>侨乡人拥有现成的跨国移民网络,如果想出国谋生,必然会找到同乡或同宗族在海外已立足的兄弟帮忙,而后者也认为有义务为对方提供从移居到如何谋生的支持。由于“侨眷”在获得出国护照及取得入境签证上都占有优势,因此,在侨乡就出现了有亲靠亲、无亲“找”亲之风。于是,人们通过传统的子女联姻、儿女过继“建立”起人为的亲缘纽带,侨乡的跨国移民网络由此更新和扩张,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新移民,显然这也是新移民潮产生并且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 四、浙南侨乡新移民潮的发展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人类社会进入了“国际移民时代”。就宏观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移民潮是中国经济走向开放与发展的必然现象,是中国劳动力资源融入世界劳动力大市场需求的必然趋势。浙南新移民潮在“国际移民时代”得以继续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其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几特点。

首先,浙南新移民潮持续发展,出现了分布广泛又相对集中的特点。据统计,浙南新移民占浙江全省新移民总量的90%,其中尤以来自温州地区和丽水地区的青田县的新移民占绝大多数。浙南新移民的最新海外状况可以通过浙江省侨办提供的最新侨情普查统计资料了解。据浙江省侨办统计,截至2005年底浙江全省海外移民总数达到共140多万人(包括港澳),分布于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40个国家,109484人;欧洲39个国家,477624人;美洲25个国家,229709人;非洲37个国家,7176人;大洋洲5个国家,14366人;港澳地区284002人)。从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新移民前往欧洲的人数最多,体现出了浙江移民潮的发展趋势有着分布广泛又相对集中的特点。

其次,浙南跨国移民潮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由“求生存”向“求发展”转变的过程。以温州市丽岙镇为例,该乡镇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并不存在为求生存而出走海外的动因。但是,丽岙镇人口中却有一半以上移民海外。这一方面是因为丽岙人普遍存在着“出国好挣钱、多挣钱”的意识,另一方面是因为乡民们恪守“老乡帮老乡”、付出不问回报、讲信用等中国民间社会人际交往的信条。丽岙乡民可以凭借移民网络,在出国费用、出国去向、海外安置工作等方面更容易得到境外同乡的支持和帮助,出国是为了创造更多、更快的经济利益。

再次,随着各国边境管制的加强、移民政策和法规的日臻完善,80年代盛行一时的非法移民现

象正逐渐降温,现在的新移民是以劳工输出和家庭团聚等合法出国途径为主。当然,只要存在移民动机,非法移民行为就不可避免,但是非法移民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

最后,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浙南跨国移民潮仍持续发展,并呈现出网络化发展的特点。以谋求发展、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奋斗目标的新移民,已经不再是墨守成规仅在移入国一地求发展,而是在多个目标国之间来往,寻求商机。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的浙南跨国移民越来越多地定期来往于家乡与移入国,在国外创业积累一定的资金实力后,再回到充满商机的国内寻求新的投资机会,跨国移民的流动性在不断的增强。浙南移民的跨国网络促进了人口、信息、资金的跨国流动,促进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经济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同时也促进了浙南跨国移民活动更具活力,绵延不断。

以上通过考察百年以来浙南跨国移民潮的历史变迁,可以认为浙南跨国移民潮的发展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当代浙南跨国移民潮的形成也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密不可分。当代浙南跨国移民潮发展所呈现出的数量、质量和影响力等全方位提升的可喜趋势,既是一代代浙南移民积极进取的结果,也体现了在祖国繁荣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新移民正在以更为远大的目标为追求,以新的面貌和姿态走向世界。

(本文在实地调研和写作过程中得到香港大学研究员钱江博士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 注释:

- [1][2][3] 陈慕榕主编:《青田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1、286、641页。
- [4][28] 方山乡编纂委员会编:《方山乡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118、119页。
- [5] 陈里特:《欧洲华侨浙籍部分史料》,未刊本,第15-17页。
- [6][13][18][19][21] 浙江省文成县外事侨务办公室编:《文成华侨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1、6、11、11、12页。
- [7][10] 温州华侨华人研究所编:《温州华侨史》,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72、51页。
- [8] 浙江省侨史研究室编:《浙江华侨史料》,1987年,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存,第15页。
- [9] 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青田县志》,1990年,第642页。
- [11] 麻卓民:《早期旅法青田人概况》,《欧洲时报》2002年11月20日。
- [12] 陈里特:《青田人出国到欧洲经过》,《青田文史资料》第六辑,1995年,第5页。
- [14][20][22] 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434、524、515页。
- [15] 周望森、陈孟林:《青田华侨史稿》,青田县归国华侨联合会编印,2005年,第43页。
- [16] 陈慕榕主编:《青田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43页。
- [17] 朱礼:《文成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27-228页。
- [23] 浙江省侨联编:《关于浙江省新移民情况的调查报告》,《华人华侨论丛》第二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第1-11页。
- [24][25] 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4、136页。
- [26] Anthony Fielding, *Migrant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s: the evolution of European migration policies, Russell-ing: Mass Migrations in Europe: The Legacy and the Future*, London: Belnaven Press, 1993, P61.
- [27] 李明欢:《欧盟国家移民政策与中国新移民》,《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106页。
- [29] 温州华侨华人研究所编:《郑氏家族侨谱》,1995年印制,第5页。
- [30] 吴潮:《浙江籍海外人士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责任编辑:乔云]

(下转第80页)

[20][22][23] 梁英明:《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下的华人与印度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21] Rajakrishnan Ramasamy, *Caste Consciousness Among Indians Tamils in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4 .pp. 55-101.

[责任编辑:乔云]

## Indian Immigrants in Malaya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Time

LUO Sheng-rong WANG Ai-pi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1, Yunnan)

**Abstract:** The laborer immigration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tim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a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Malaysia today. This article is just to identify Indian immigrants' characteristics by analyzing the origins, economic condi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of Indian immigrants, and also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contemporary ethnic Chinese in Malaya.

**Key words:** Malaya, colonial period, Indians

---

(上接第 73 页)

## Transnational Emigration Waves from Southern Zhejiang: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LIU Ying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The transnational emigration from Southern Zhejiang has a long histor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migration flow have shown a number of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insofar a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is concerned. Based on fieldwork interviews and archival researc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ransnational emigration originated from southern Zhejiang with a focus on the causes and features exhibited in different stages. It further observes current emigration from this region while probing into the different factors at work and the possible trend in the years to come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for those who stud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regional history, as well as those who work on the current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n governments of different levels.

**Key words:** southern Zhejiang, waves of transnational e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s